

与中国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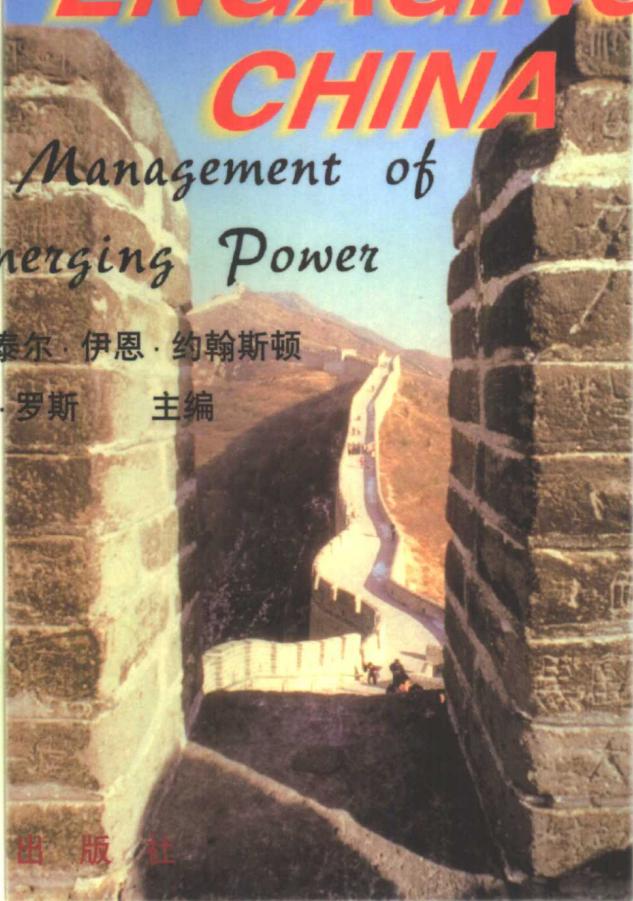
—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瑟斯顿

罗伯特·罗斯 主编



新华出版社

与中国接触

——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美]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主编
罗伯特·罗斯
黎晓蕾 袁征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 (美) 约翰斯顿，(美) 罗斯编；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

ISBN 7-5011-5125-3

I. 与… II. ①约… ②罗… ③黎… ④袁… III. 对华政策—研究—世界 IV. D8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756 号

京权图字：01-2001-0340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edited

by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UTLEDGE

©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与中国接触

——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罗伯特·罗斯 主编

黎晓蕾 袁征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0803)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307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25-3/D·812 定价 24.8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面均贴有防伪标志)

撰 稿 人

阿米塔夫·阿查亚是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曾经是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和南洋技术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是东南亚事务和亚太地区安全专家。他是《东南亚的新地区秩序：后冷战时期的东盟》（国际战略研究所，1993年）一书的作者，并正在完成一本关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著作。

维克多·车是乔治敦大学政府系和外事服务学院助理教授，著有《对抗下的联盟：美国—韩国—日本安全三角》（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他在《亚洲评论》、《政治科学季刊》、《亚洲研究》、《朝鲜研究》、《安全对话》、《朝鲜和国际政治》和《亚洲视角》这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国际关系和东亚的研究文章与评论。车教授是前福布赖特学者、哈佛大学奥林国家安全研究员和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也曾经为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从1998年到1999年，他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和福布赖特高级学者。

保罗·埃文斯从1981年起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国际关系。

1991 年到 1996 年期间，他担任过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亚太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1997—1998 和 1998—1999 学年度，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访问学者。从 1999 年 7 月起，他就职于温哥华的英联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他近来的写作集中在亚太的第二轨道安全进程和多边机制构筑问题上，最近，他同戴维·凯普和福岛秋之（Akiko Fukushima）一道完成出版了《论亚太安全：中文和日语翻译术语词典和对于日语翻译的一个注解》（亚太研究联合中心，1998 年）。

袁丰康（音译）是新加坡南洋技术大学国防和战略研究所的副主任、副教授。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是国际研究协会副会长（1999—2000 年），并著有《战争的相似之处：朝鲜、慕尼黑、奠边府和 1965 年越南的决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 年）一书，另一本有关东南亚安全合作源泉的书也即将完成。

史蒂文·戈尔茨坦是位于曼彻斯特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的教授。他撰写的文章涉猎范围广泛，其中包括中国共产主义的演变、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当代中国国内政治等问题，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台湾政治和海峡两岸关系。

迈克尔·乔纳森·格林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奥林亚洲安全研究员。他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代理所长和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著有《武装日本：国防生产、同盟政治及战后寻求自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 年）一书；与人合著《21

撰 稿 人

世纪的美日安全同盟》（对外关系委员会，1997年）；还有与人共同编著、即将出版的《美日同盟：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9年）。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约翰·洛布社会学副教授。他是《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作者，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将各国纳入国际机制的书。

迈克尔·利弗是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他以前是该中心国际关系教授，1991—1995年间担任中心副主任，目前是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欧洲分会的秘书和联合主席。他是《现代东南亚政治词典》（劳特利奇公司，1996年）一书的作者，早先出版的著作包括《印度尼西亚对外政策》（阿伦和昂温公司，1983年）。

玛格丽特·皮尔逊是位于科利奇帕克的马里兰大学政府和政治学副教授。她是《中国的新商业精英：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两书的作者，目前正致力于研究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机制及这一进程对中国贸易政策与行为的影响。

罗伯特·罗斯是波士顿联合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合著，W. 诺顿公司，1997年）

和《协商的合作：美中关系，1969—19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

兰德尔·施韦勒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致命的不平衡：三极和希特勒征服世界的战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的作者，还在《世界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美国政治科学》、《国际安全》和《安全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1993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约翰·奥林博士后国家安全奖学金。

前　　言

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它与各个国家的长期利益休戚相关，这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相关方面：一是自 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预示着它将发展成为经济和战略大国，而且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其大国地位；二是东亚地区已明显感觉到目前中国战略地位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许多观察家相信，21 世纪的中国将成为主要大国关注的经济和战略发展的焦点。

中国实力的增长反映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影响体现在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之中；它的轻工业出口影响着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和以出口为主型国家的经济；它工业基础的提高引起周边国家对环境污染的忧虑；它国内居民的消费模式引起人们对全球食物和能源短缺的关注；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出口既影响了全球核不扩散的权威，又影响了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区域势力均衡；它的现代化军事能力加深了东亚邻国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战略发展，几乎反映在每一个国际议事日程表中。

中国对地区和全球的即期影响明显。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加深了全球先入为主的观念——多方面认为，如果中国按目前的速度发展并全部实现其经济和战略发展潜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渴望或者真的会在东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并具备与美国相抗衡的全球影响力。中国这方面的潜能更加渲染了当前对中国行为

的评价，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影响了针对中国制定的短期双边和多边政策。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全球各国在对华政策及“中国威胁”方面的争论。

冷战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不断提高，预示着它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大国。有鉴于此，国际对华政策始终具有不确定性。究竟怎样的政策才是应对新兴中国长期的双边和多边政策呢？在美国，存在着有关“接触”和“遏制”的争论，有关“接触”的概念较为模糊且经常自相矛盾；而“遏制”则是一种比较强硬、无法通融的路线。在东亚、南亚、中亚、欧洲、北美及世界各地，决策者和学术界人士也就此在相当程度上展开了类似的争论，只不过所用的术语不同罢了。

人们在冷战后就采取何种相对对策来应对中国及“中国威胁论”展开争论，这反映了各国领导人过去一直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处境——如何在既适应他们本国地方短期的民族利益又符合他们参与和规范国际秩序中的利益，特别是在避免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有史以来，任何大国的出现都是一个骚动的过程。在此期间，各国外交官和决策者长期摸索应对的策略，却往往不成功。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人们对新兴大国与主要战争之间的关系及旨在对付强国冲突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生动地论证。

当代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便是这种骚动过程的最近一个例证。对有些人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和发展，很有可能预示着国际间的不稳定。过去，决策者们应对这种可能性的政策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国家主要选择了一种叫做“接触”的政策。然而，人们是最近才开始使用“接触”这个术语来表示历史上试图以和平方式顺应大国兴起的一种外交政策。在 1936 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访问慕尼黑之前（译者注：1938 年他曾签订了纵容德、意侵略的《慕尼黑协定》），一般采用“绥靖”政

前　　言

策一词。因这种政策现已名誉扫地，所以当前各国领导人不得不否认“接触”就是“绥靖”政策，尽管这两种政策内容和目的都基本一致。

与新兴大国成功接触是优先选择的政策。与遏制及相关联的大国紧张局势和战争危机相对应，成功的接触能在保有尚未形成的大国的主要利益的同时，既不会在短期内加剧紧张局势、造成大量损失，又不会在将来引起争夺霸权的战争、造成国际动荡局势。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成功接触也很罕见。因为不管明智与否，过去的决策者们已经选择了遏制，或者由于他们是与“无法满足的”国家进行接触，又或者是他们采用了一种有缺陷的接触战略。

本书试图致力于分析各国针对中国的兴起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就此说来，本书就选择接触的原因，在何种程度上优先选择接触政策，以及接触战略的构成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地调查和分析。它力图了解，与一个新兴大国进行接触，是怎样不但反映出在同一政策下追求不同的价值观的实际困难，而且能反映每个国家与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与此同时，本书的作者们想让更多的人理解，各国在应对新兴大国的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同时，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这种压力影响着战略决策的选择和决定。

本书首先介绍了与新兴大国接触的理论和历史，目的是将书中对当前与中国接触的分析和历史、理论逻辑联系起来。接触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始终结合过去的理论和外交概念，希望能将分析建立在现有的学术成果和外交实践的基础之上，以便于人们理解如今经常出现的外交问题。我们特别希望，能将接触置于一个迄今各国所采用的应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标准模式之中：平衡，追随，约束和进行协商。

然后，本书从两个相对独立的角度来阐述接触战略。首先，它将接触的范围从传统的与大国的关系，扩大到囊括更广范围内

一系列国家的经历。本书承认大国在决定适应新崛起国家的战略方面起主导作用。其中一些篇章，是关于美国和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中接触的特点和作用。而本书编者认识到小国出于它们各自的安全利益和地区秩序考虑，也同样被迫需要调整政策以准备长期应对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它们意识到，掌握广义的新兴大国的含义和接触战略的复杂性能够指导当地各国如何与新兴大国接触，其中包括提供许多政策选择和告知影响广大参与者决策的各种因素。本书围绕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重要性不同的各国，按照政治体制和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分别对它们与中国的双边接触战略的特征和成效展开论述，从而可以有效地进行比较。

本书所涉及的当地参与者包括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韩国是当地与中国有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家之一。北京和汉城持有许多相同的战略观念，并有着密切而广泛的经济联系。与此相对的另一极端是台湾。台湾与中国大陆就外交认可展开竞争，且面临着中国军队的威胁。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居于韩国和台湾之间，由于掌握了更多的与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它们更愿意发展一种多面外交政策。在多面外交政策中，完全对立的接触和遏制共存，反映了它们在该地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面对中国各自不同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国和当地各国对接触的战略观念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应对新兴大国的战略的机会。

本书论述接触的第二种独到的方式是，对这些参与者与中国的多边接触进行了深入地探索。自冷战结束以来，多边战略和经济组织迅速发展，老的国际组织不断拓宽领域；为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机构又不断涌现，制定国际规则的机构和多边外交变得愈来愈重要，它们承担起制定和保持冷战后区域和全球秩序的责任。因此，成功地应对新兴大国需要进行多边接触，而全面地接触需要长期发展和调整多边机构，以适应中国的崛起。

前　　言

书中分别从地区和全球的角度，就安全和经济问题，阐述了与中国的多边接触战略。它们不但论述了各国如何在多边组织中与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双边外交，而且还在具体篇章中就国际团体与中国的接触展开论述，认为接触使北京成为积极参与各类旨在制定规则和加强信任度建设的国际合作组织中的一分子。中国加入多边组织促进了它与这些国际组织的交往，激发了其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兴趣，并使中国在解决国际冲突问题上与国际社会达成一致。书中就这些方面做了详尽的阐述。

由于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接触进行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本书对接触战略的分析深入而又全面。为使诸位作者之间的对话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使读者对各国的接触战略的含义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作者们在写作中都采纳了有关接触的共同的定义。为便于传达本书的目的，接触被定义为：

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这个成长的大国所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及全球秩序相一致。

在该定义中，改善这个正在崛起的主要大国的行为不包含阻碍相关势力增长的努力，而阻碍其发展应该理解为“遏制”。我们既没有为“改善”下定义，也没有界定“改善”的方式，而是采纳了诸位作者各自对各个国家或各多边组织所实施方式的归纳和论述。“非强制性方法”指的是，顺应其合法利益，转变其偏好，在国际组织的约束下进行双边和多边交往。

作者们明确地将接触与遏制区分开来。与遏制相比，接触既不限制、约束或阻碍目标国势力的发展，也不阻止其影响力的扩大。毕竟，接触目的是通过鼓励新崛起的大国满足于不断演变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从而使其“合群化”。我们对接触的解释特别强调不包含任何强制政策。

我们知道这种关于接触的解释不可能完全抓住各国具体政策的

复杂特征。但是，我们希望在统一的概念下进行写作，以有助于作者们在应对崛起大国方面有一个一致的理解，并得出关于接触的总的概念和结论，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作者们就讨论书中的内容先后会见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见时，他们提交并讨论了各自的研究计划和可能得出的结论，并就该项目中的许多方面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关于接触的定义。第二次会议的参加人员包括所有的作者和一些有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研究专家。作者们在会上提交了与会论文，大家对此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在此基础之上，作者们又重新整理修改原文，使本书得以最后完成。从开始到结束，会议一直在一种相互合作的和谐氛围中进行。

参加第二次讨论的人员有：

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

王逸舟(Wang Yizhou)

艾伦·怀廷(Allen S. Whiting)

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J. Christensen)

傅高义(Ezra Vogel)

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

约瑟夫·菲丝米斯(Joseph Fewsmith)

理查得·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

我们感谢以上各位在讨论中提出的严谨而富有创意的见解。另外，我们还要感谢 Halpern Associates 的无私贡献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此书不可能得以顺利完成。

编 者

目 錄

撰稿人.....	(1)
前 言.....	(V)
1. 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	兰德尔·施韦勒 (1)
2. 与中国接触——来自韩国的观点	维克多·车 (44)
3. 接触的条件：台湾的大陆政策	史蒂文·戈尔茨坦 (77)
4.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接触——进退维谷 ...	麦克尔·利弗 (115)
5. 新加坡经济和政治接触的时机	袁丰康 (142)
6. 遏制、接触，抑或反控制？.....	
马来西亚面对新兴中国的对策	阿米特乌·阿查亚 (169)
7. 应对中国——来自日本的观点	迈克尔·乔纳森·格林 (198)
8.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接触	罗伯特·罗斯 (230)
9. 主要多边经济组织与中国接触	玛格丽特·皮尔逊 (269)
10. 中国与多边安全机制的接触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保罗·埃文斯 (304)	
11. 结论	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罗斯 (351)

图例

图

- 图 1.1 不满足现状的新兴大国的分类 (29)
图 1.2 应对崛起、不满足现状的大国的政治 (31)
图 10.1 中国加入的条约占其所能加入条约的比例 (308)
图 10.2 合作的质量 (319)
图 10.3 合作质量的分类 (321)
图 10.4 中国合作的质量 (322)
图 11.1 大战略的分类 (352)
图 11.2 美国、俄国和中国所占世界军事开支的份额 (358)
图 11.3 预计的和实际上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数量 (372)

表

- 表 2.1 中国与韩国的贸易：1979—1996 年 (47)
表 2.2 中国与北朝鲜的贸易：1970—1995 年 (48)
表 2.3 韩国在华投资：1989—1996 年 (56)
表 2.4 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对华无偿援助：1989—1996 年
..... (56)
表 2.5 中国与韩国的民间互访：1985—1995 年 (57)
表 2.6 可能的接触后果 (59)
表 6.1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贸易：1985—1995 年马来西亚
的进口和出口 (178)
表 6.2 制衡、追随和反控制 (190)
表 10.1 中国军备控制活动的相互关联矩阵 (309)

应对大国的崛起： 历史与理论

兰德尔·施韦勒

通常来说，世界政治史被认为是讲述各个国家和地区崛起与衰落的故事。有时，这些命运变幻的速度就像飞快的、令人头昏目眩的骑术比赛。这种变化在希洛多德时代的希腊城市国家间显而易见。希洛多德观察到：“先前伟大的城市大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像现在这样强大的城市过去却是弱小的。”^①这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 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的发展。在此期间，西班牙、荷兰和瑞典从列强的最前列栽了下来（波兰在地图上被抹去），而法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则变成了大国。

在 19 世纪，这样的命运轮回并不存在，英国、德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奥地利保持了它们大国的地位。但是，到了世纪之末，美国、日本和意大利却叩响了大国之门。从 1945 年以来，没有新的国家跃进大国的行列，却有一个国家从这一行列中跌落了出去。

不管结构变换是引人注目的还是几乎难以察觉的，是狂风暴雨般的还是平稳的，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等级排列在持续不断

地发生着变化。正如肯尼迪所言：“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速度不同和技术上与组织机构上的突破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比其他国家更大。”^②认识到这一点，本章提出一个问题：国际体系是如何适应新兴国家崛起的？更为具体地说，就是既有强国如何成功地应对与和平地接纳正在崛起的、对于现存国际秩序不满的挑战者？

大国的转换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但这些转换最好是缓慢、稳步地进行，而不是发生在爆发全面危机的氛围之下。粗略地扫视一下对人类历史长河的记录，可以发现既有大国对崛起国家做出反应的特点及成功与否，不仅在各个历史时代各不相同，而且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个案上也不尽相同。正如大多数对于历史的解释一样，这种变异是由环境因素（如国际体系的结构特点）和处理因素所造成的。关于后者，关键的问题是：崛起的大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其在那一秩序里的位置到底是如何不满的？其修正主义要求的程度和性质是什么？既有大国如何看待它的要求和意图？崛起的大国能够获得必要的力量（内部或外部的）通过武力改变国际体系吗？这些必要的改变到底如何影响其他大国的利益？

本章从探讨何时崛起大国是危险的及为什么等问题开始，逐步揭示既有大国可能对于新兴大国做出的不同政策反应，再按照新兴大国的目标和风险倾向将它们归类。在最后一部分，将新兴大国的特性（在此前部分讨论过）同既有大国成功选择的回应政策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新兴大国的危险

关于如何处理一个新兴大国的问题，是在假定大国的兴起是危险的这一基础之上提出的，因此要求既有大国制定出一个行动战略或计划。这就引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新崛起的大国是危险